

论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

杜佳峰

(北京大学历史系 100871 北京,中国)

摘要:基督徒如何才能过正当的生活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值得所有基督徒去思考,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15世纪末,萨伏纳罗拉修士发现佛罗伦萨在人文主义世俗精神的指引下,虽然物质上取得了成就,但在精神上充满了欲望和罪恶。于是,他提出“基督徒正当生活”的设想,引领人民走上基督徒应该过的正当生活之路。本文梳理了“基督徒正当生活”的理论架构和内容措施,并将其置在人文主义传统中进行考察,发现它对人文主义思想的补充之处,还揭示了它在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发展中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萨伏纳罗拉、佛罗伦萨、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恩典。

作者:杜佳峰,男,198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电话:(86)18810521146。电子邮件:18810521146@yeah.net,邮编:100871。

15世纪末,驻足阿诺河南岸山顶眺望北岸佛罗伦萨城,天神般高耸庞大的圣母百花大教堂矗立于市中心,威严的执政宫塔楼傲视着城市每个角落,人文主义熏陶下的佛罗伦萨,从物质上看似乎都是富丽堂皇、欣欣向荣。入城后却是另一番光景,平民精神空虚,既苦于生计,又放纵于酒馆和赌桌,城市显贵缺乏信仰,迷失于权术财富,困顿在宫殿和宴会里,生命被欲望和激情消耗殆尽。人民心中的失落和不满如同冬季的阿诺河河水在逐渐上涨,城里人浑然不觉,直到河水漫过堤岸,忽然发现整个城市顷刻淹没在汹涌的洪水之中。1494年佛罗伦萨的社会困难集中涌现,城市显贵和平民慌忙寻找自保出路,世界末日的情绪蔓延,安全缺失、不公正、冷漠、焦虑感随之喷涌,原本光鲜的市民生活陷入黑暗之中。

一位费拉拉的修士来到佛罗伦萨,他叫吉罗拉莫·萨伏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1490年成为佛罗伦萨的圣·马可修道院院长。萨伏纳罗拉看到人文主义思想滋生的享乐主义使人迷失了信仰和虔诚,意识到人文主义过分偏重世俗生活的缺陷带来的问题,于是,他向佛罗伦萨基督徒提出了“正当生活”的倡议,并将其发展成为一场社会运动。“基督徒正当生活”运动得名于萨伏纳罗拉的《正当生活指南》,^[1]这是一篇萨伏纳罗拉在死囚牢中秘密写下的文章,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决心,但仍不忘教导佛罗伦萨基督徒如何过正当生活,在他死后还能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前行。回顾整个运动,萨伏纳罗拉提出了“基督徒正当生活”改革学说,在改革个人生活习俗,还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保障正当生活的进行。1498年,部分敌视改革的城市显贵通过城市暴动,将萨伏纳罗拉逮捕并处决。萨伏纳罗拉虽死,但推行“基督教正当生活”的时期被后世认为是佛罗伦萨道德的“黄

[1]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87-190.

金时期”，他发起的基督徒正当生活运动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

但长久以来，关于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的研究总是被置于别的论题之下进行考察，它被分别置于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史和社会史的视野中进行讨论，^{〔2〕}这导致了关于基督徒生活模式本身的研究尚付阙如。已有的对“基督徒正当生活”的研究往往归于“道德改革”（moral reform）的名目之下，最具代表性研究有唐纳德·温斯顿（Donald Weinstein），他将这场运动认为是社会道德的改革，萨伏纳罗拉是一位道德改革家。从这个角度只停留在现象层面理解萨伏纳罗拉的事业，“道德改革”只是萨伏纳罗拉的手段和过程，但是“道德改革”背后有“恩典—得救”理论的支持，其目的不只是单纯地纯洁社会道德，更是为了用基督教伦理理性弥补人文主义的缺陷，使基督徒得救，而“道德改革”视角无法认识这场运动的来龙（理论依据）和去脉（目的性）。所以，有必要对萨伏纳罗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进行重新考察。

1. “正当生活”理论对人文主义的完善

人文主义的缺陷是重世俗轻精神，在人文主义长期占主导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个缺陷产生了严重后果。从早期的但丁、彼得拉克等人注重文化的人文主义，到中期布鲁尼和萨卢塔蒂偏重政治的市民人文主义，再到费奇诺和皮科时代的重哲学思辨的新柏拉图主义，人文主义思想一直占据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主流。它是一种世界观，宣扬个性解放、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维护人性的尊严、主张个人价值的实现等等，但是，它也带来了追求享乐、信仰冷漠等众多问题，这些缺陷在15世纪末的佛罗伦萨尤为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萨伏那罗拉提出了“正当生活”理论。在1498年4—5月撰写的《正当生活指南》中，萨伏那罗拉简明扼要地提炼出“基督徒正当生活理论”：“所有好的基督徒的生活都源于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缺少这些恩典没有人能够得救”。^{〔3〕}这说明基督徒的正当生活关系到能否拥有上帝的恩典，而上帝的恩典又关乎基督徒是否得救。得救对于每个基督徒是最为重要的事情，萨伏那罗拉通过“正当生活—拥有恩典—基督徒得救”这一过程，说明了基督徒正当生活的意义重大。萨伏那罗拉分析了恩典与得救的因果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上帝恩典死去，他将立刻堕入地狱……（死后）为了不落入那里（地狱），你们要有序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并学习如何一直保持在上帝的恩典之中”。^{〔4〕}基督徒的得救与否和获得上帝的恩典建立了联系，而佛罗伦萨人过积极向善的生活就能获取上帝的垂青。

他还指出正当生活精神要素与人拥有上帝的恩典要经历三个阶段：通过真心实意的悔恨罪行，以

〔2〕 从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史角度对萨伏那罗拉的研究：Nicolai Rubinstein, *The Government of Florence under the Medici: 1434 to 1494*,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Donald Weinstein, *Savonarola and Florence: Prophecy and Patriotism in the Renaiss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uro Martines, *Power and imagination: city-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 (New York: Knopf, 1979); Lauro Martines, *Scourge and Fire: Savonarola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昆廷·斯金纳 Kuntzing Sijina [Quentin Skinner], 《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文艺复兴》*Xiandai zhengzhisixiang de jichu*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南京 Nanjing: 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Press], 2011), 155-159; Alison Brown, *Medicean and Savonarolan Florence: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Humanism, and Religion*, (Turnhout: Brepols, 2011).

从社会史角度的研究：Richard C. Trexler, *Public Life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Lorenzo Polizzotto, *The Elect Nation: The Savonarola Movement in Florence, 1494—15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tefano Dall'Aglio, *Savonarola and Savonarolism*,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10).

〔3〕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87.

〔4〕 Girolamo Savonarola, “The Art of Dying Well (Ruth and Micheas, Sermon XXVIII)”, in Girolamo Savonarola, *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 by Anne Borelli and Maria Pastore Passar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

获得恩典;通过远恶近善(远离邪恶、接近善德),以增加恩典;具备忍耐精神,以保持恩典。

真心实意地悔恨自己的罪行是获得上帝恩典的起点。真心实意的悔恨是做忏悔礼的首要基础“他会懊悔和不满自己过去的罪行,会坚定地远离罪,会达到真正的悔恨,这是做忏悔的第一基本要素”,只有在真心实意悔恨自己罪恶的情况下,人才会“必须勤思自己的罪,包含思想和欲望上的罪、言语中的罪、邪恶的行为等等”,^[5]从而获得上帝恩典,实现个人和社会在尘世和天国的双重幸福,拥有良好的基督徒精神对于每个佛罗伦萨人得救是最重要的事务。因此,基督徒好生活之路的第一步是真心实意的悔恨自己的罪,以建立人和上帝的联系,从而获得上帝的恩典,人才能被上帝拯救。缺乏悔恨之心将使人无视上帝,犯道德的罪,从而失去恩典。

在获得上帝的恩典之后,唯有远恶近善的态度才能增加这份恩典。萨伏纳罗拉提出,基督徒在精神上秉持远恶近善的态度,减少对尘世的爱,去加增对上帝的爱,这样才能加增上帝的恩典,“必须使自己远离恩典的对立面,向它的根源靠拢……使上帝的慈爱和恩典降温的是人对尘世的事物的爱,故此,人必须撤走对这些短暂无常事物的爱”。^[6]接着,萨伏纳罗拉列举了一些远恶近善的具体措施包括:首先,在生活中抛弃虚荣的修饰,坚持简朴生活,“人应该在饮食、衣着和其他方面都秉持简朴生活,放弃所有的虚饰”;其次,远离淫欲,纯洁生活,“逃离女色和其他淫欲,即使是已婚,他也应该尽可能保持贞洁”;最后,远离人之骄妄,接近基督徒的虔诚,“他必须逃离人的骄妄,不去在乎别人的羞辱……他应该保持虔诚,静思基督的受难,向上帝忏悔他的罪恶,与神父进行精神上的交心,向上帝祈祷保佑自己远离罪恶和险恶”。^[7]这些远离尘世罪恶,接近基督教至善的精神操练,这反映出萨伏纳罗拉秉持的是与世俗荣耀不同的基督教精神。

最后是通过终身的坚持,长久地保持上帝的恩典,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精神要素是忍耐。这一阶段是针对那些已经开始过正当生活的基督徒,他们仍然需要不懈地努力,避免各种恶的侵袭,以防止再次落入道德罪恶之中。萨伏纳罗拉开列了许多要素,但把忍耐作为最重要的精神要素,尤其是在艰难困苦中的忍耐精神,“在灾难中,人应该保持忍耐,相信上帝降给我们灾难是为了我们的好。人永远不应被疏忽和懈怠所战胜,而放弃已经开始的好生活”。^[8]在最后这一阶段,忍耐是最重要的精神要素,萨伏纳罗拉称其为“来自上帝的最伟大的礼物”,^[9]它能帮助基督徒终身遵守正确的生活之路,保有恩典,最终在死后被上帝所拯救。

从理论自身来看,“正当生活”思想是一个具有完整内在逻辑性,正当生活-恩典-得救的过程展现了基督徒和上帝的互动。它是一种合作论,即基督徒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神的恩典,人可以持续努力直至终身保有神的眷顾,神的恩典也是为了带给基督徒精神上的好,这与人文主义追求的尘世上的好明显不同。从萨伏那洛拉的“正当生活”理论的三项精神要素来看,“悔恨罪恶”、“远恶近善”和“忍耐”等精神要素,它们也都是针对人文主义的重世俗、轻信仰的缺陷而制定的基督教伦理规范。

二、萨伏那洛拉的改革与基督徒人文主义

基督教人文主义按照《圣经》原则,把基督教伦理作为重要的指导依据,用伦理理性的善净化人原始本性中的恶,把基督精神运用于家庭生活、工作和社会生活之中,并对世界进行改造。基督教人文

[5]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87.

[6] *Ibid.*, 188-189.

[7] *Ibid.*, 189.

[8] *Ibid.*, 190.

[9] *Ibid.*, 190.

主义者的代表是伊拉斯谟,他在1516年写作了《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又于1530年出版了《儿童行为的手册》,他希望通过君主和儿童的教育,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理性的人。与之相似,萨伏那洛拉的“正当运动”也是直接触及佛罗伦萨人的生活,基督徒“正当生活”的实现,不仅需要佛罗伦萨人精神操练和理论认知,更需要革身体力行和现实磨砺。向善的生活意义重大,不仅与个人死后得救有关,还关乎基督徒日常过一种朴素的好生活。革除市民生活中的不良习俗,用基督教伦理规范个人生活,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从萨伏纳罗拉提出具体要求中,反映出一种正当生活之善与市民生活罪恶的对抗。因此,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思想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

针对那些世俗生活中“邪恶”的欲望,萨伏纳罗拉用禁欲与之对抗。禁欲是禁止“邪恶”欲望在佛罗伦萨的蔓延。他认为佛罗伦萨男性市民“邪恶”的欲望源于同性恋行为。男性的同性恋被认为是“违背上帝设定的自然规律”的严重犯罪行为,佛罗伦萨的同性恋泛滥严重污损了城市的声誉,使得百合花(佛罗伦萨的标志)成为意大利指代同性恋的标志。萨伏纳罗拉说:“执政团有必要通过法令去反对这种受诅咒的行为,因为它使得佛罗伦萨在意大利臭名远扬”,不仅要通过立法“好不留情的”惩罚这种行为,“这些人应该被砸死和烧死”,而且还要禁止人们在言谈中讨论它。^[10] 禁绝腐化市民道德的不良习俗是萨伏纳罗拉对于基督徒生活的重要要求,恶习的激情遮蔽了理性对生活真谛的认识。

萨伏纳罗拉还倡导简朴(simplicity)反对虚荣。简朴生活是真正基督徒与市民生活的虚荣和浮奢之间的重要差异。佛罗伦萨女性的时尚是追求美丽的衣饰,孟浪的打扮:盛妆的佛罗伦萨妇女穿着裸露的长筒袜和衬衫,还有那些穿着裁剪出长开叉长袍的年轻女子,一阵微风就能显出整个身体。女人来到教堂向男人展示自己,就像妓女一样,不戴面纱,裸露秀发。^[11] 萨伏纳罗拉认为这些厚颜无耻的性暗示是“恶魔的工具”,都应该被摒弃,要用简朴来取代虚荣,“专心于简朴,不要羞于穿着尽可能的简朴,因为你们仔细思考就知道,这不羞耻,而是荣誉和实用。”^[12] 同时,萨伏纳罗拉还号召童子军在街道和广场干预妇女的不道德着装,“一些男孩在马泰利路扯下了一个女孩的面纱,……这事发生的原因是:吉罗拉摩修士鼓励男孩去反对穿戴不得体配饰的妇女……现在,妇女也都穿着谨慎了。”^[13] 反对虚荣的要求,表现出一种基督徒以简朴视作生活之美的态度。

针对佛罗伦萨修士缺失灵性的情况,萨伏纳罗拉提出用节制。节制能约束肉体,净化灵魂,恢复修士个人生活中的灵性。萨伏纳罗拉在《论谨慎和睿智的修道院生活》中提出严格的节食修炼和全心向上帝祈祷的规定:年满21岁身体健康的修士必须持续节食;21岁以下和病弱者也至少在周一、三、五进行节食,在其余日子晚餐也只吃面包和水果。^[14] 其次,修士还需要遵守《五项守则》:对修会满怀热诚,迫切要遵守每一条教规;内心谦卑;保持静默;经常祈祷;在内心和身体上都互相尊重。^[15] 这些严格的节食规定、修道守则体现出萨伏纳罗拉对于基督徒神职比普通人更高的要求。节食修炼是通过饥饿身体来规训修士的身心,“那些喜欢感官享受的人,他的精神和身体将会变得软弱”,而“节制禁欲将会使精神更强壮,使善功更强,使身体更强健,将会更长寿”;^[16] 而五项守则增加灵性。这些表明

[10] Girolamo Savonarola, “The Venetian Model for Republican Florence (Aggeus, Sermon XIII)”, in Girolamo Savonarola, *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 by Anne Borelli and Maria Pastore Passar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57-158.

[11] Donald Weinstein, *Savonarola: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enaissance Prophe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188.

[12] Girolamo Savonarola, “On Social Order (Aggeus, Sermon VII)”, in Girolamo Savonarola, *Selected Writing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 by Anne Borelli and Maria Pastore Passar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48.

[13] Luca Landucci, *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 to 1516*, tr. by Alice De Rosen Jervi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7), 101. (1495年2月7日日记)

[14] Girolamo Savonarola, “On the Prudent and Judicious Way of Living in the Order”,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81.

[15] *Ibid.*, 182.

[16] *Ibid.*, 181.

萨伏纳罗拉对修士个人生活的要求,是旨在提升修士的灵性生活。

萨伏纳罗拉还要求用频繁地祈祷来抵御信仰的冷漠。为了唤醒佛罗伦萨基督徒内心的宗教情感,抵御世俗生活导致的宗教冷漠,在生活中需要有更加频繁的祈祷。普通人应该在生活中常思祈祷,“在早晨醒来起床时,他必须做祈祷。又如参加弥撒时,他必须保持虔诚,默想基督的受难,向上帝坦白自己的罪行,之后和神父进行精神上的交心,祈求上帝保佑自己,在主日要避免所有罪恶和不洁。在进食前,他应该做一小段祈祷;当夜里他准备睡觉之前,应该先做祈祷和誓愿。”^[17]针对修女,萨伏纳罗拉在1497年撰写了《浩劫时期应该遵守的十条法则》一文,建议修女在灾难来临之前需要的五项祈祷是:第一,祈祷上帝派遣善良的牧羊人来管理子民;第二,祈求上帝赐予识别善者和恶人的谨慎辨别力;第三,请求上帝赐予鲜活和真正的光以使人明白圣礼中的善;第四,跟随好的告解者,过真正贫困和简朴的生活;第五,获得神圣精神的七项礼物。^[18]处于灾难中,修女需要:第一,经常交心,忏悔自己的罪过;第二,勤勉地祈祷;第三,祈祷上帝能击退敌人;第四,祈祷上帝尽快结束灾难;第五,祈求上帝通过灾难中保全善者,清除恶人。^[19]通过普通基督徒日常生活中的祈祷和修女的专职祈祷,改变佛罗伦萨世俗社会宗教意识冷漠的状态。

对于基督徒少年儿童,他主张通过教育克服儿童顽劣的本能,用专门的儿童组织培养少年的宗教热忱。通过组织“童子军”,把佛罗伦萨6岁至16岁之间的男孩组织成童子军(fanciulli),佛罗伦萨城市按照每区一支的方式组成了四支童子军,每支童子军都选举自己的队长,佛罗伦萨政府最高机构执政团授权任命这些队长。童子军中的男孩被要求着装简朴,头发长度不能超过齐耳。萨伏纳罗拉的助手多米尼克·达·佩亚修士用军队的队列队形操练童子军的少年儿童。在1496年的狂欢节,萨沃纳罗拉的童子军举行了首次盛大巡城游行,沿途还为穷人寻求市民的募捐。童子军的规模也达到惊人的四千人数。萨沃纳罗拉通过组织童子军对佛罗伦萨少年儿童进行的教育,在一段时期内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积极有序,这与之前的“顽童”形成了鲜明对比。之前的狂欢节,少年们在广场上进行足球游戏,达到大混战的程度,邻近的商店都不得不关门。夜晚少年们在广场的篝火旁唱歌和跳舞,互相投掷石头取乐,没有一年不鸣丧钟的,因此,被称为“狂野的石头游戏”。^[20]萨伏纳罗拉的目标是把佛罗伦萨的顽童变成基督教的道德楷模,平时童子军还担任道德监察的工作,维护佛罗伦萨人符合道德的生活。童子军对于佛罗伦萨的不道德产生了明显的威慑效果,对于赌徒来说,只要人喊一声:修士的男孩来了!无论多大胆量的赌徒都逃走。^[21]

这些要求和举措,使同时代的人切身体验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期。佛罗伦萨人圭恰迪尼既是萨伏纳罗拉改革的亲历者,也是历史学家,他盛赞这个黄金时期:“他(萨伏纳罗拉)在促进得体行为上做的努力是神圣和不可思议;在他的时代之前佛罗伦萨从未有这种善行和虔诚。在他死后,它们消失了,这正反映出他引入和保持的美德。在他的时代,人们不再在公共场合赌博,甚至在家里也不敢。昔日用于放纵宴请和挤满邪恶青年的酒馆被关闭了;同性恋受到禁止和责难。大量妇女放弃了羞耻而淫荡的衣着。几乎所有的男孩放弃了可耻的游戏,被带回到神圣而得体的生活方式中。”^[22]萨伏纳罗拉在引进和推广这些基督徒正当个人生活上的努力,让亲历者高度评价他的功绩,“因为在我们、我

[17]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89-190.

[18] 七项礼物:智慧、理解、忠告、刚毅、知识、虔诚和敬畏上帝(Isaiah 11:2).

[19] Girolamo Savonarola, “Ten Rules to Observe in Times of Great Tribulations”, in Girolamo Savonarola, *A Guide to Righteous Living and other works*, tr. by Konrad Eisenbichler, (Toronto: Centre for Reformation and Renaissance Studies, 2003), 177-180.

[20] Ralph Roeder, *Savonarola: A Study in Conscience*, (New York: Brentano's Publishers, 1930), 165.

[21] Luca Landucci, *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 to 1516*, tr. by Alice De Rosen Jervi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7), 101. (1495年2月7日日记)

[22] Francesco Guicciardini, *The History of Florence*, tr. by Mario Domandi,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146.

们的父辈和祖辈所处的时代,从未有一个修士拥有如此多的美德,或者说从未有一个人获得如此高的名望和权威。……我确实相信:如果他是好的,那么我们见证了一个自己时代的伟大先知;如果他是坏的,我们见证了一个伟大的人。”^[23]

萨伏纳罗拉“正当生活”的本质是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他用基督教中的善去对抗人性本能中的恶,用基督教善的原则去规划人的生活方式,用禁欲、简朴、灵性、虔诚和热忱等基督教善的准则去克服纵欲、虚荣、属世、冷漠和顽劣等世俗世界恶的习性。通过个人生活改革的实践,萨伏纳罗拉将基督教善德化为具体行动,让佛罗伦萨人亲身体验和切实感悟到了基督教向善的生活方式。正当生活的动力,不仅来自于对死后得救的渴望,更来自于普通基督徒对日常好生活的追求,内心对善追求的天性使人恪守正确的生活之道。

三、对社会环境的营造

在良好的社会氛围的保障下,人民更易于实现基督徒正当生活。增加佛罗伦萨社会的公平、公益和公德是萨伏纳罗拉社会活动努力的主要方向,从1494年至1498年间,在他倡议下,佛罗伦萨政府通过了许多旨在营造良好社会氛围的制度,改革税收制度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公平,建立国家救助制度以增进社会的公益,改革节日庆典以培养公共道德。

首先,社会的公平,税收是最重要的表现之一。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经济利益。针对1494年佛罗伦萨的经济困境,萨伏纳罗拉提出用“十一税”(La decima)取代以往的“财产评估税”(Il catasto)。萨伏纳罗拉的“十一税”或称为李维税(Levy)得名于它10%的固定税率。它的征税对象是佛罗伦萨城里和周边的房地产,它固定税率,征税周期为一年一征。1495年2月5日,大议事会正是通过了这项法案。与之前的佛罗伦萨之前的税收制度相比较,“十一税”体现出公平的原则。比起评估所有财产,地产的数量和归属都十分明确。对于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的税率也体现出公平性。萨伏纳罗拉虽是教会人士,但他主动要求教会也向政府交纳地产税。根据1498年的记载,佛罗伦萨的教会需要交纳五万金佛罗琳的地产税,^[24]这将极大缓解政府财政紧张和市民的税收负担。佛罗伦萨之前的税收方式存在诸多弊端。1427年美第奇家族掌权后,科西莫·德·美第奇出台了“财产评估税”,它要求市民申报自己的所有财产,然后税务官进行评估,之后数年里公民根据这个评估的数额进行纳税。它看似公正,但家族的财产在变化,评估却数年一次,许多家族的财产减少,但赋税却没有减少;并且,在财产评估阶段,美第奇家族拉拢亲信势力,给敌对家族痛下杀手。比较新旧税制之后,可以发现“李维税收是单纯基于房地产的税收,它将取代政府的长期的任意征收制度。”^[25]从制度上废除了武断地征收和摊派,建立更加合理的税收制度,这是在佛罗伦萨第一次,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意大利也是首创了固定的房地产税,废除了包税和任意征收的传统,此项税法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体现着社会公平原则的税制是保障基督徒生活的重要环节。

其次,通过建立政府救助机构,帮助困境中的人民,这是体现了公益的原则。佛罗伦萨是一个以商业立国的城邦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对于陷于困境的基督徒商人意义重大。对此,萨伏纳罗拉还提出建立国家低息借贷机构(Monte di Pietà)的提议,为的是既化解高利贷的城市痼疾,又满足了基督徒正当商业活动的需求。高利贷问题长久困扰佛罗伦萨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商业城市中,市民的商业活动需要资金借贷,但高额的贷款利息却成为沉重的负担,借贷是商业活动的必需行为,而高利贷又与

[23] *Ibid.*, 148.

[24] Lauro Martines, *Scourge and Fire: Savonarola and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6), 258.

[25] Pasquale Villari, *Life and Times of Girolamo Savonarola*, tr. by Linda Villari, (London: T. F. Unwin, 1988), 275.

基督徒的道德标准不符,也与神法和自然法不符。之前佛罗伦萨的借贷业一直被高利贷所垄断,由于借贷行业的利率高 32.5%，“按照复利,那么借 100 佛罗琳 50 年,需要归还的金额高达 49792556 佛罗琳”,这并不是后世历史学家的假设,而是当时建立国家低息借贷法令上的记述。^[26] 高利贷者多为犹太人,他们被认为是乘人之危和盘剥吸血,被丑化为精明的蛆虫合丑陋腐化的人,谴责高利贷的法令上批判道:“邪恶的漩涡和腐蚀的蛆虫,已经在佛罗伦萨存在 60 年了,他们是背信弃义的和被上帝所痛恨的希伯来(高利贷者)。”^[27] 因此,这种腐化社会道德的高利借贷需要得到疏堵结合的治理。

萨伏纳罗拉建立的国家低息借贷的目的是:救助城市里贫困的基督徒,解下层商人和民众的燃眉之急。在 1495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筹建法令规定:选举八名无薪酬的市民担任公贷官负责策划详细章程和具体事务,无薪酬是因为“那些照顾穷人和困苦者的人是受到祝福的,在逆境中他将被主所解救”,^[28] 故此公贷官员都是自愿为荣耀上帝而工作的。而且,高利贷将在一年内逐步禁止。1496 年 4 月 21 日,国家低息借贷法令被大议会通过,法令规定:每个市民一年最多借贷 600 佛罗琳;贷款的利率是 5% - 7.5%,但借钱的市民必须发誓借贷的钱不能用于赌博。^[29] 萨沃纳罗拉所提倡市政府建立公共借贷机构,解救了处于困顿的小商人,使佛罗伦萨人切身感受到基督徒正当生活的好处。

最后,改革节日庆典有助于公共道德的培养。萨伏纳罗拉还把反对虚荣、提倡简朴的基督徒教育注入到传统的节日庆典之中,用虔诚的节日气氛培养人民的宗教情感。他把 1496 年和 1497 年的狂欢节变成为吟唱圣歌、宗教游行和“焚烧虚荣”(Bonfire of the vanity)的庆典。四旬节开始之前的一周里,萨沃纳罗拉的童子军在城里挨家挨户劝说人们过简朴的生活,要求人们放弃“虚荣之物”,童子军把收集来的“虚荣之物”堆积在执政团广场的木架上。在一周狂欢节的最后一天,童子军先是进行巡城大游行,到达执政团广场,他们把收集来的淫秽画作、情歌、舞会的面具、华丽的衣服、纸牌、骰子和淫秽小说《十日谈》、《巨人传》等堆成金字塔烧掉,人们围绕着焚烧虚荣之火高唱圣歌,庆祝简朴生活方式的胜利。通过熊熊的虚荣之火,萨伏纳罗拉赋予了节日庆典宣传基督教简朴生活的寓意,同时代人深深地为这种教诲所吸引,见证“焚烧虚荣”庆典的佛罗伦萨普通市民兰杜奇在日记中说:目睹这般庆典后,人们动容地说:“这种转变真是上帝的工作。少年们定会享受修士给他们带来的好事物”。当兰杜奇看到自己的孩子们也在“受祝福和虔诚的队伍”中时,他激动不已,“这些我记录的事情都是真实的,我亲眼见证了,亲身感受了如此的激情”。^[30] 萨伏纳罗拉把基督徒简朴生活、反对虚荣的道德教育和节日庆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改造节日教育佛罗伦萨人的做法给市民留下深刻的记忆,他对于节庆制度的改变,激发出内心的宗教热忱,培养了人民的公共道德。

透过公平、公益和公德等良好社会环境,佛罗伦萨的基督徒感受到正当生活的好处。萨伏纳罗拉在社会制度上的思考,既是处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也是在营建一个适宜基督徒生活的美好社会。

结语:

文艺复兴早期但丁的文学人文主义、布鲁尼时期的市民人文主义和到费奇诺时代的新柏拉图思想,这三种人文主义有一个共同点——世俗性的特征,这些世俗人文主义都有着重人世、轻信仰的弊病。虽然,它们在很长时期里促进了佛罗伦萨的文学、政治思想和哲学的前进,但是却积累了享乐纵

[26] *Ibid.*, p. 295.

[27] 出自 1495 年 12 月 28 日法令,转引自 *Ibid.*, 296.

[28] 出自 1495 年 12 月 28 日法令,转引自 *Ibid.*, 296.

[29] 出自 1496 年 4 月 21 日法令,转引自 *Ibid.*, 296.

[30] Luca Landucci, *A Florentine Diary from 1450 to 1516*, tr. by Alice De Rosen Jervis, (New York: E. P. Dutton & Company, 1927), 102. (1495 年 2 月 16 日日记)

欲、自私自利等流弊。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改革正是针对这些弊病,他通过伸张基督教伦理,去抑制这些世俗人文主义中负面因素,因此,萨伏那洛拉的“正当生活”是对世俗人文主义的矫正。

萨伏那洛拉处于从世俗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过渡阶段,这场社会运动的要素和措施都关注人的精神,并直接接触及人的生活,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可以认为“正当生活”思想是一种人文主义思想。更重要的是,萨伏那洛拉虽然本人没有系统地写作理论著作,但他与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基本思想和改革原则是一致的,都是根据《圣经》和基督教伦理去教育基督徒,这表明萨伏那洛拉开始呈现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特征,这也与世俗人文主义向基督教人文主义演进的过渡阶段相契合。

从更长远的视角观察,还会发现一条西方思想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思想轴线:世俗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不是一种贪婪,反而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抑制,是一种理性的伸张,而这种理性来自于基督教的伦理理性。萨伏那洛拉的“基督徒正当生活”思想,体现出以基督教伦理之善抑制人原始本性之恶。所以,它既是对之前的人文主义的弊端进行修正,也蕴含着后世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特征,它是西方思想中世纪向近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对于今天的基督徒,它同样有着启示作用。五百年前,萨伏纳罗拉的思考和行动为今人提供了一个借鉴。在基督徒身上,有两种品质最容易让人动容,一是思考,它能为生活指明方向,既是在最危难的困境中,也能找到出路。另一种是坚持,在日常生活中,即使是最不起眼处,也秉持原则,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既是付出生命也不放弃。这两种品质兼备的基督徒很难找到,然而,在萨伏纳罗拉身上,却能看到这两种美德交相辉映。这两种品质也使得萨伏纳罗拉从一个平凡的外国修士,成长为佛罗伦萨家喻户晓的圣人,使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荣耀。

在一个市民社会中,基督徒应该过怎样的好生活,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萨伏那洛拉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过一种朴素向善的生活。死后的得救是所有基督徒渴望的最高奖赏,但得救的过程比结果更具有意义,把基督教的各种善德融入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不仅是为了死后的得救,更是为了每一天的好生活。

English Title:

On Savonarola's Righteous Christian Living

DU Jiafeng, male, born in 1985, History Department i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 R. China,
Tel: (86) 188-1052-1146, Email: 18810521146@yeah.net, Zip code: 100871.

Abstract: How should a Christian live a righteous life is a question for all Christians. It is also historically foundational. At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Savonarola found that Florentine citizens had accumulated enormous material wealth under the guise of humanistic secularis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spiritually overwhelmed by sin and desire. He initiated the notion of a “righteous Christian life” as a guide. This article comb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octrinal system of “righteous Christian life,” and explores its role as an aspect of Humanis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righteous Christian life” is integral to 15th-century Humanism and a philosophical bridge to later Christian Humanism.

Keywords: Savonarola, Florence, Christianity, the Christian way of living, grace.